

一代通儒姚奠中和他的传记

□韩玉峰

传记文学作品《姚奠中》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传主姚奠中是我的老师，作者王东满是我的朋友。姚奠中是名高天下的山右通儒，王东满是多才多艺的上党奇才。由王东满为姚奠中作传，可谓知人善任，实属难得。传主和作者都十分熟悉，这就更增加了对这部传记作品的亲切感。

《姚奠中》传全书9章50万字，内容厚重，印制精美，特别是书中有大幅插图，包括姚先生的照片、书信和书画作品，尤显珍贵。

我在山西大学读本科时，姚先生是教授，读研究生时姚先生是导师。在先生门下受教6年，此后仍不断地受到先生的教诲。今读《姚奠中》传，对先生近百年的治学道路和人生经历有了系统的了解，更使我加深了对先生的敬仰。

一、姚奠中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书法家，被周汝昌称为“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的通儒，其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早年师从民主革命家、国统大师章太炎，后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多所高校任教，1951年调入山西大学。先生一生从教60余年，称誉教育界，桃李满天下。

传记以宏阔的视野、深刻的思辨，通过反映姚奠中近百年的人生经历与从教治学经历，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反映当时社会的总体风貌和文化思潮，使传记不但写出了传主个人的人生经历，还折射出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出中国近百年的政治风云、民族命运、文化发展、学术演变，引导读者阅读姚奠中传记、回顾近百年历史，使其成为一部以一位知识分子的传奇人生为主线的、艺术化的中国社会变迁史和思想发展史。这就使它的价值超出人物传记本身，而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

传记表现了姚奠中高尚的理想信仰、道德情怀、文人风骨和学术操守，表现了先生面对各种变故、劫难无怨无悔，百折不挠，“不阿”“不苛”“不固”“不馁”“不湮”的知识分子气节，表现了先生忠诚于教育事业，坚守做人作文之道的精神和对人民、对祖国的赤子情怀。

书中提供的丰富的生活故事使我走近我的老师，了解了 he 当年所过的艰辛日子、所忍受的屈辱岁月，了解了他内心的愤懑和痛苦，但也感受到他的崇高人格、

骨气和坚韧意志。

1958年响应“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先生和我们班同学一起到山西西铭乡采矿；1959年响应“把课堂搬到农村”的号召，先生同我们一起去洪洞马牧下乡。无论是山上还是乡下，先生都是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西山要冒着危险挖矿石，在马牧要顶着烈日割小麦。在马牧，先生还要给我们讲课。课堂就在马牧村一座大庙的戏台上。这样的日子先生都是怀着乐观的情绪和我们一起走过来了，当然也更赢得了学生对先生的敬爱。师生间凝结了一种非同寻常、患难与共的情谊。

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困难时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饱，饿肚子，得浮肿病。青年学生们是这样，年纪大的老师们也是这样。姚先生为了4个年幼的孩子能够填饱肚子也得去挖野菜。这种苦日子直到1962年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时才有好转。

1962年春节，中文系召开教师座谈会。座谈会的主楼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年更比一年好”几个大字。座谈会上给每一位教师发了一小袋干果，有花生和枣。当时这些食品大家都很久没见到了，拿到后都十分兴奋。姚奠中也参加了座谈会。他非常高兴，赋诗《春节联欢二首》：“嘉会新春好，开怀纵谈深。风云观世界，济世有同心。”“日丽山河秀，阳回大地春。前途花似锦，思想贵时新。”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诗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党的路线、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政治思想上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思想上的解放，学术上的民主，言论上的自由，是从未有过的。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意味着过去的那种上纲上线、斗争哲学、动辄得咎的局面再也不会出现了。所以，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最满意、最拥护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了过去不可想象的地位。我的老师姚奠中的命运变化就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传记第九章“天回地转开新史”（1977—2010）对先生这一时期的生活有生动的描述。这33年，先生“雨后老耄嗒嗒

穹”、“年逾古稀笔愈健”、“张艺动京城”、“德业如日升”，谱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新篇章。先生凭借自己的道德文章，以及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和崇高地位，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社会的认可，担任了“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和1988年两次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成为备受社会尊重的一代通儒、国学大师。

姚奠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境遇变化，极有说服力地反映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三中全会前先生劫难频频，三中全会后先生在社会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这种变化体现在姚奠中的身上，也体现在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上，只是先生更具有代表性。

在这“天回地转开新史”的33年，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成果不断，接连推出几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有与弟子梁归智共同编选出版的《梁园东史论文集》，有与弟子董国炎合作编撰出版的《章太炎学术年谱》，有与学生阎凤梧共同主编出版的《通鉴纪事本末全译》，以及大量的诗词、序跋、论文等。

姚奠中1993年的《八十自述》、2003年的《九十自省》《九十抒怀五首》是了解先生思想感情的最好作品。《八十自述》的“坎坷蹭蹬，曾无芥蒂。不见成功，犹思难已”；《九十自省》的“未能息以踵，九十不斯期。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九十抒怀五首》之五：“满眼江山满眼新，平生志气一朝伸。不言衰老循规律，国富家兴遍地春。”先生一生劫难频频，挫折不断，但他不计前嫌，不存芥蒂，仍然是兢兢业业，笃行不倦，而90回首仍然感到“德业愧前哲”，先生还要在“国富家兴遍地春”的好日子里，不言年衰老，迟暮惜光辉，可见先生胸怀的博大和志趣的高远。

二、传记作品要写出传主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社会贡献，以及当时社会对传主的影响和传主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使其深刻、厚重，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这些最基本的要求，王东满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宏观把握和微观叙事相结合，既可以使读者了解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气候、文化氛围和先生的思想脉络、事业成就，又可以通过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和有血有肉的形象刻画，使读者走近先生的内心世界。书中既有“立主脑”的立意恢弘，又有“密针线”的细腻铺陈，读起来时感荡气回肠，又觉生动亲切，充

满艺术质感。

作者叙事和传主口述相结合，使全书更具真实感。全书主要是作者的叙事，但其中插进了大段的传主口述历史。这一部分对了解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及思想感情极为珍贵。我们从先生的口述中可以了解先生“大跃进”年代随学生到太原西山采矿的艰辛，感受先生在困难时期带着孩子们苦度饥饿日子的辛酸，了解先生“文革”中在学校烧锅炉的情景……先生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书中都有生动的描写。

《姚奠中》是一部传记作品，但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和知识性。作者考虑到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对一些典籍、术语和人物往往有简明而准确的介绍，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提升阅读兴趣，增加知识积累。

姚奠中在坎坷人生途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传记中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或印象好的人往往书写其姓名以铭刻在心，而对于多次整过自己的人，在叙事需要提及时，则是只记其事而隐其名，显示了先生仁者之心。这同样也反映了先生广阔的胸怀和气度。

王东满撰写此书，访谈传主，查阅资料，核对史实，遍访姚先生的学生、亲友，构思框架，撰写书稿，前后历时将近4年，终成巨著。书中饱含着他对姚奠中的敬仰之情，也反映了作者渊博的文史知识和娴熟的文学笔法。王东满以小说、诗歌和书法名世，这就使他笔下生辉，文采风流，增加了传记的可读性。作者记叙姚先生的学术成就时，用词严谨缜密，行文气贯神通，惟求论述准确，而叙述姚先生的日常生活时，又似喁喁私语，如诉家常，语言流畅朴素。

这里我想起姚奠中写给王东满的一首诗和东满献给姚先生的一首诗，读后又觉有新的感受，那就是前辈对后辈的褒奖，后辈对前辈的敬仰，这同样是一种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光焰永久。

姚奠中先生读过《王东满诗词书法集》等作品后，曾题词相赠：“知君小说入千家，不料诗词亦可夸。自是多才多艺手，砚池飞墨笔生花。”姚先生对东满可谓褒奖有加，东满称之为“句句珠玑，字字千金”。王东满的《敬酬姚奠中老》：“为人学稼双犁，桃李不言天下誉。寿若精金坚且美，学如瀚海广而深。一支秃笔黔高古，两袖清风拂士林。墨舞龙蛇迎晚照，气扬神飞暮天云。”王东满如此评价姚奠中的学识人品与精神风貌，可谓名实相副。

赵树理研究的一个独特收获

——读刘长安的长篇小说《苦旅》 □师力斌

在当代作家中，对农村有深入透彻理解的并不多，作为一位并非专业人员的基层干部，刘长安之所以对赵树理研究感兴趣，并怀着强烈的冲动和巨大热情来重写赵树理以及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世界，原因恐怕正在于，他对赵树理无限崇敬，对赵树理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对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不平之鸣。刘长安想一吐为快。尽管赵树理离世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也30余年了，时事变化天翻地覆，然而，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和农村依然闪耀着新鲜锐利的光芒，他对农村问题的把握依然卓尔不凡，毫不过时，有点像鲁迅写中国人的文章，是常为新的，是可以反复品味的。赵树理提出过的问题依然是问题，他的思考依然犀利，他的结论依然有效。这就是经典作家的魅力。

刘长安写《苦旅》，正是抓住了赵树理的经典性，也强有力地印证了赵树理的经典性。赵树理不愧

是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他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还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轻视赵树理最大的恐惧感恐怕就是哈佛教授夏自清。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里对赵树理不无贬损，以一种纯粹西方的标准将赵树理贬得一钱不值。说赵树理早期小说除了“滑稽语调及口语”，“找不出太多优点来”，说《李有才板话》跟《小二黑结婚》不过是“民间幽默的粗糙尝试”，这两个故事“写得笨拙”，是“嘻嘻哈哈为党作宣传”，说《三里湾》关于范灵芝内心矛盾的描写是“无意幽默而闹出来的滑稽”。总之，这位描写中国农民的行家里手在哈佛教授眼里完全变成了文学的门外汉，不过就是“仅有初中程度”“在一家报纸工作的无名干部”。夏自清作为贬赵扬张（张爱玲）的第一推手，大陆文学界和出版界无不受其影响。

历史不容抹杀。仅靠一种海外结论，并不能降低赵树理的地位。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各种农村问题的呈现，人们对赵树理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他把握大历史的眼光与艺术创作的复杂性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新的评价。刘长安的《苦旅》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

《苦旅》实际上不是小说，而是传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以一种非常感性的、传记式的笔法，还原了赵树理的创作历程和思想价值。无论是赵树理对农村的深刻了解和把握，还是对农民生活、思想、观念的熟悉和把握，都深深地打动了刘长安的写作。可以看出，作者对赵树理长期扎根农村，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坚持真理，始终严肃认真地描写农村发展历史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都抱以无限的认同和无比的崇敬。《苦旅》全面细致地回顾和描述了赵树理的人生历程和创作过程，展现了这位农民作家艰难曲折、勇敢光辉的一生，再现了一位终生心系农民、全力关注农村发展的作家形象，令人感慨万端。之所以名为《苦旅》，而非其他什么传记、生平之类的平淡题目，正是要突出赵树理在曲折的历史和尖锐的矛盾斗争中艰难前行的人生道路，正

是要突出这位农民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正是要突出赵树理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放歌的精益求精的艺术创作态度。而这些宝贵的艺术精神，正是当前农村题材创作中所匮乏的。改革开放30多年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事物源源不断地创造和发生着，新的观念与思潮汹涌澎湃地冲击着，可是，关于农村的创作却依然远远跟不上这种变化，重复、狭窄、陈旧、琐碎、小气、俗套的写作现象大量存在。赵树理的写作仍然有启示意义。

《苦旅》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以赵树理的作品为核心结构全篇，是对赵树理创作的一次全面回顾和重读，带有浓重的研究色彩。刘长安下了很大的功夫。从早期的《万象楼》《小二黑结婚》，到中期的《孟祥英翻身》《地板》，再到后期的《十里店》等，几乎将赵树理所有重要的作品都进行了历史性的还原，描述和回答了赵树理为什么要创作这些作品，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特别是政治运动情况，作家是如何创作的，有哪些灵感冲动和思想活动等诸多问题，大到天下国家，小到鸡毛蒜皮，全方位的描述使该作如同一部电影，将赵树理的创作人生展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许多对作品的把握不无独到之处。比如第二十五章《〈锻铁锻炼〉，究竟叫谁锻炼锻炼？》就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他不是从宏观上和理论上探讨“吃不饱”“小腿疼”两个文学典型形象，而是详尽细致地还原了这两个文学形象诞生的全过程，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思想，到全国的合作化运动形势，到长治农村的实际情况，再到队干部、社员的生活状况，直到赵树理与吃不饱的人物原型李保珠、小腿疼的原型韩招弟二人的详尽对话，以及他给长治地委的信，一一做了交待。一竿子插到底。立体化的还原手法，使这部作品在占有资料、刻画人物上占据了独特的优势。不敢说这些描写都是百分百的真实，但基本的脉络和框架都有严格的材料依据，而那些细节又发挥了文艺虚构的长处。在写法上，《苦旅》很有《三国演义》的味道。之所以定位为小说而不为传记，或许作者的用意在此。这种写作结合了纪实与虚构二者的长处，便于将自身的独特体会和真实史料融会贯通。正如作者所说，第十章、第十二章等，都运用了这种演绎方法。这些描写为我们研究和认识赵树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我们进入作家的内心世界提供了许多线索。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刘长安独特的优势。首先，他是晋东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理解赵树理的创作上，比其他省籍的学者有优势，比起夏自清恐怕更有优势。对于赵树理独特的方言、生活经验及地域文化的体认，都使这部作品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其次，他占有了大量资料。为写这部作品，刘长安阅读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并阅读了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他是抱着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来准备这次创作的，并没有因为是小说作品就省略了资料上的功夫，作者对赵树理的崇敬之情可见一斑，这本书的价值和分量也就显而易见了。

与刘玉民相识是在他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那时人们熟知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寄予更大期望的也是长篇小说。而果然，在事隔几年之后，他的长篇力作《过龙兵》出版并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后再我又读到了他的诗——新古风诗。那些诗洋溢着生活气息和哲思韵味，让人读过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后来便是竹枝词了，包括《济南竹枝词》《胶东竹枝词》《山东竹枝词》。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的惊奇——那时我并不知道刘玉民早在少年时代便是一位痴迷的诗歌爱好者，并不知道他是在动乱年代山乡中的一盏油灯下读完《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以及《女神》《雷鋒之歌》，并且写出厚厚一本新诗和新古风诗来的；只是由于后来的种种际遇，才使他与诗歌疏离了三十年，而即便如此，诗情也从未在他心中和笔下消失。“没有诗情就谈不上文学和创作，更谈不上艺术和感染力”，这是他的认知也是他的实践。从他的小说、散文和许多作品中，人们是不难感受到诗情的激荡和浸染的。

竹枝词是发轫于巴渝一带的古老民歌，经由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发掘变成一种新诗体，却仍然保留着语言通俗、音调明快特点，因而得以风行八方。竹枝词开始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后来逐渐演变成“广为记事，以诗存史”，也即以记述地方风俗史为主的诗歌形式。因为二十几年前刘玉民读过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并且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十几年后，当他有心想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济南写点什么的时候，竹枝词便出现在面前了。他先是尝试着写了三十几首，没想到受到了欢迎和鼓励，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放下手头的创作计划，拿出将近三年的时间，走遍山东省17大城市，先后写出580多首，并在《人民日报》和山东省十几家报刊相继发表，形成了山东诗坛和地域文化建设中的一大景观和收获。

作为一种深受群众欢迎的诗体，竹枝词在山东省也早有流传，如明代王象春的《齐音》，清代董芸的《广齐音》，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以及当代徐北文的《济南竹枝词》等等，但这集中在济南、潍县等少数几个地区，内容也多以记述风景景物为主。刘玉民的《山东竹枝词》则囊括了全省各地，涵盖了历史、文物、传说、民俗、物产、风光、时尚、建筑、艺术、地理、气候等方方面面，成为山东第一部民歌体的当代风俗史，其创新性和地域文化方面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是足以夸耀于后人的。

《山东竹枝词》包罗万象、色彩斑斓，却并无松散杂乱之虞，是因为刘玉民在深入各地采风 and 考察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了地域文化这条主线，突出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和引领作用。如济南的泉水文化，济宁的孔孟文化，淄博的齐文化，临沂的红色文化，聊城的水城文化，泰安的泰山文化，莱芜的钢城文化，潍坊的风筝文化，东营的黄河口文化，青岛、日照的港口文化，烟台的海洋文化，威海的渔乡文化，菏泽的牡丹文化，枣庄的煤矿文化，如此等等。其中如泉水诗、渔家诗等还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and 影响。即使地域文化特点并不突出的德州、滨州等地，由于选取从枣乡文化和退海之地的沧桑巨变等角度入手，同样写出了特点和情趣。

从艺术上说，刘玉民在新古风诗创作中一向追求的是“不囿唐宋体，但求古诗神”的境界，这种追求引伸到《山东竹枝词》，则是打破传统格律诗的束缚，将民歌与新古风诗融会一体，创作出一种既具有诗情画意、又自由酣畅的风格。如写黄河口荒原的：一望无垠是荒原/二望无垠是盐田/三望无垠是大海/四望无垠有苍天。

写湿地公园的：十万芦荻十万花/十万鸥鹭十万家/十万红菱十万船/十万诗篇醉天涯。

写路边酒家的：土鸡土鳖几大碗/土鱼土狗又几盘/土菜土瓜土井水/还有土酒使劲灌。

在记述和描写各地的风情景物时，刘玉民还不时把目光指向人性和人生感悟的深处。如《济南竹枝词》中的“荷花宴”是这样写的：荷花居然佐琼浆/酥炸软蒸有新香/但得入内能祛毒/人心从此透清芳。

《淄博竹枝词》中的“范仲淹”是这样写的：少年踪迹雨后泥/千年去后众生觅/寄语当今同仁友/美文一篇胜虹霓。

自然，《山东竹枝词》中最受欢迎的还是记述和描写当代民间风俗和老百姓生活状态的部分。如《济南竹枝词》中的“山会”：道是山会非重阳/数千男女相鸳鸯/更有白发父母在/也收信息也烧香。

“学生”：过河卒子过山羊/夜半未睡清早慌/若问天下谁人苦/上学孩子第一苦。

“家长”：孩子贪玩好心急/孩子拼命也煎熬/写了教育骂学校/终了还挤独木桥。

《烟台竹枝词》中的“对嫁”：好女不嫁岛上山/嫁到陆地住草房/岛部偏娶好姑娘/山乡远来上楼堂。

“遮面”：头戴斗笠面遮纱/两眼朴朴水晶花/海风水雾皱人脸/粗黑如何去见她。

《威海竹枝词》中的“渔家号子”：无词无曲众口传/风涛生处风涛欢/阿呀咿哩哩咿哟/沧海吼出鱼万船。

“登船”：登船容易笑脸难/竹节大杯面前端/一口喝尽兄弟好/不喝管你多大官。

作为发源于民间并且特别注重秉承民间精神的诗体，竹枝词在“记事”和“存史”中，一向对百姓疾苦多有描述，而对于百姓不齿和痛恨的某些社会现象则加以讥嘲和鞭挞。《山东竹枝词》中也不乏这一类佳作。如“二猪猪肉”：父母下岗致残/小本生意半饥寒/可怜孩子上学苦/猪肉二两好解馋。

再如“赋闲”：六十退休五十闲/精壮汉子度余年/养花溜狗打扑克/妻儿都骂白拿钱。

如此等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竹枝词》中的附文。明清以来的竹枝词大多附有注释，但那不是说明事情的原委就是注明诗或典的出处，并无文意的意蕴存乎其中。《山东竹枝词》的附文却大相径庭，不少篇章文字虽短，却融进了不少知识和情趣，有的还蕴涵哲理和哲理。譬如《临沂竹枝词》中对陈毅、粟裕的追忆，使人读后肃然而生敬仰之心。《泰安竹枝词》中对醉心石的议论，《淄博竹枝词》中对地域文化的议论，使人读后顿有所悟。《烟台竹枝词》中有关王懿荣最初破解甲骨文

的记述，让人读后不觉哑然失笑。《枣庄竹枝词》中“李宗仁”一首的附文是这样写的：

知道李宗仁这个名字是在许多年之前，为的是他从美国返回后，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知道李宗仁的功劳并且为之感动的——不仅仅是李本人，还包括他的那些英勇顽强的将士们——却是在台儿庄战役纪念馆里。人的一生可以有种种表现，包括失败和并不光彩的时刻，但不可以没有辉煌。只要有辉煌在，人生就会被照亮，历史就会被照亮。反之便只能与尘土和灰烬为伴。李宗仁和台儿庄给人的启示是太多了。

读着这样的文字，面对成功或失败，或荣光四放或黯然失色的人生，让人不思考怕也是难以做到的吧？

正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文学。我想，《山东竹枝词》亦是如此。但作为山东第一部民歌体的当代风俗史，《山东竹枝词》的出版确乎值得我们为之庆幸和珍惜。

透析被漠视人群的情感追求

□钱文婷

朱辉的小说《大案》（《人民文学》2011年第3期），写的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为“大案”的过程。无论如何，案子确属鸡毛蒜皮，然而案子虽小，主题并不小。它艺术地透析了被漠视的底层人群的情感追求问题。

走街串巷收废品的男人、小饭馆里端茶倒水的服务员……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长期被漠视甚至忽略，于是“底层文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但是，如果作家们找不到那个“点”，不注意他们天赋的情感欲求，不把他们当成“人”来刻画，我们的“底层文学”就将无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为某一类人代言的状态。这种竭力降低身段呐喊呼吁的状态，其实是文学的窘境。

《大案》从一个鸡零狗碎的案件入手，饶有兴味地叙述了一个盗窃案，着眼点却在于一个城市外来人员的情感追求。犯案的是收废品的周长根，他与小饭馆的服务员小翠结为露水夫妻，为了长久地和小翠在一起，无奈答应了小翠要一条狗的要求，于是，一条来自“流浪犬收容站”的狗让他进了派出所。故事一波三折，尺水兴波，本来是一件小事，后来是记者接到爆料闻风而至，进而破案能手孙队长又介入案子——他“善于从细微的线索中抓住要害，最大的本领是从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中牵出大案”。孙队长独具只眼，他考证出此狗非凡狗，原来是价格昂贵的洋狗，于是，案件升级了，周长根锒铛入狱。

小说趣味盎然，非常好读，但这往往更需要我们细读。《大案》经得起细品。我们注意到：在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物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周长根偷狗是因为要吃狗肉。小翠那句“无狗不成家”极易被人忽略，或者被认为是矫情。这样的惯性思维甚至被周长根本人自己所接受，并被用来为自己辩解，“我承认狗是我偷的。我就是偷了吃肉。我嘴馋，我该死！不过——”他哀求道，“这狗也就是个吃货，十几斤肉，一斤狗肉十块钱，这么算还不行啊？”他的辩解当然是徒劳的，因为孙队长手里掌握了动物学家的鉴定证明。

更不应被我们忽略的是，这个案子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十分扎实，无懈可击，孙队长毫无错误，记者们也毫无错误，那个“充满爱心”的慈善家李女士，泽被流浪犬，甚至还应该得到赞誉。他们的自我认知显然也是如此。果不其然，孙队长破案后，李女士给他送了一面锦旗。周长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他们彼此间的帮助和理解，充满了“爱”与“敬业”，但这个世界依然处于冰点，冷若霜霜。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应该注意：小翠作为提出要狗的人，却在男友周长根因狗被抓后，为了150元的信息费，主动向电视台爆料，这直接导致了记者的介入。原来，在一个同样身处底层的人心里，150块钱远比露水夫妻的情分要重得多。150元钱确实可以买不少肉，周长根也这么换算过，但这种换算令人胆寒。可见，周长根们的感情并不只被相对高层的人所漠视，有时候他们也被此漠视，自我漠视。《大案》既呈现了不同层级的人们彼此间的隔膜和对峙，也呈现了同一层级的人们彼此间的冷漠。

《大案》语言平实质朴，庶几可称“黑色幽默”。那只狗无疑也是小说的重要角色，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它矫矫不群，似乎能洞悉人心，为了逃离栅栏，它别出心裁，机变百出。在小说结尾，它“咧咧嘴，挤挤眼，似乎是朝他笑了一笑”。在它的这一笑之下，百口莫辩、即将身陷囹圄的周长根除了“头发晕”，又能如何？

刘玉民和他的《山东竹枝词》

□苗得雨